

一张通往幸福的车票

□高仁涛



在春运狂潮中,能买上一张称心的回家车票实在是莫大的幸福,这意味着可以在回家的熙来攘往中有自己的一脚之地,可以抚平父母混沌的眼神中无限的翘首企盼,可以温暖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疼爱的魂牵梦萦,当然更有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全家共同举杯的幸福。每当春运大潮来临,围绕着这一张小小的车票,总有太多太多难以书写的故事。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遥远的哈尔滨度过的,从遥远的黑龙江,穿过东北三省,经过河北,辗转济南,然后到达邻近渤海的家乡。每次回家都是一次漫漫征程,而买上回家的车票则是最重要的事。刚开始时,学校为了方便学生,每次在放假前几天都会邀请车站人员到学校卖票。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抢到车票,我和几个老乡总是采取组团的方式购票,几个人同时去挤,谁先挤到前面,谁就一下全买上。结果发现这个方法极不成功,想要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单枪匹马地挤过去实在不容易,于是,我们转换了策略,集中所有力量挤一个人,当大家将力量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时,前面的那个人就有了不由自主往前冲的力量,尽管会引来大声的痛斥甚至骂声,但成功率却高了许多。有几次我们就这样达到了目的,只是冲在前面的那个人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是丢了鞋子,就是衣兜被扯得支离破碎,但看到回家的车票握在手中,喜悦会冲淡所有的不快。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车站人员不再到学校卖票,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到车站去买了。由于东北的天气比较寒冷,学校放假的时间要比其他地方稍微早一些,一般不会与浩浩荡荡的民工流、探亲流交织在一起,但购票长龙还是十分壮观。记得有一次,排队排了很长时间,站得腿都快僵了,满怀期待地挪到售票窗口前,我却被温柔地告知,持有的学生证无法享受半价购票的优惠,实在是太可悲了。对一个穷学生来说,三千多里路的半价优惠还是极具诱惑力的,一丝踌躇之后,我还是决定再到位于郊区的东站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公交车的颠簸中来到远离喧嚣的哈尔滨东站。大家回家的心情实在太迫切了,尽管外面冷冷清清,但到了售票大厅,呈现在眼前的依然是长长的买票队伍,整个大厅的喧嚣和吵闹仿佛被忐忑和不安压制住了,极好地契合了外面极寒天气的肃杀和冰封。我随着大家在瑟瑟中慢慢往前走,过了好长时间,终于到我了,等我满怀热情地将学生证递过去后,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法购买半价票,事已至此我也不能再三坚持了,只好咬牙买了全价票。后来,等我到哈尔滨另一所学校念书时,情形就好了很多,校园里有一个车票代售点,只要多花五元钱的手续费,就可以免除外出购票的辗转和拥挤。那时,都是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卖票,每次回家前,我都计算好时间,在开始售票的当天就早早起床,第一时间赶到卖票的地方,这样每次我都能买到称心的车票。

一张小小的车票被寄予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在熙来攘往的摩肩接踵中,在人来人往的喧嚣吵闹中,拥有一张回家的车票,就拥有了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于永军

我生长在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农村所经历和熏染的民俗文化气氛陪伴我大半辈子,至今仍是萦绕不去的梦中情怀,它经常让我回味,令我敬畏。

在农村过年,最神圣的物像是贴春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春联的起点应溯于五代。《宋史·蜀世家》中就有后蜀主孟昶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说。“春联”作为名词出现,则在明代初年。传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除夕前颁下御旨,要求金陵家家户户用红纸写春联贴在门上,以贺新春。大年初一早上,他亲自微服巡视,每当看见写得好的,便赞上几句。正高兴着呢,碰到一家没贴春联的,便询问原因,侍从回说:这一家从事杀猪和劊猪营生,过年特别忙,还没有来得及请人写呢。于是,朱元璋便命人拿来笔墨纸砚,亲自为这家写了一幅:“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尔后又继续巡视。巡了大半天,在回官的路上又经过那个屠户家,见门上仍然光着,喝问是怎么回事,屠户恭敬地回答:“这副春联是皇上亲自写的,要高悬到中堂上,每天焚香供奉。”朱元璋听了很受用,立马赏了三十两银子。

当然,把一种习俗归为行政

□肖复兴

北京人过年,离不开包饺子肉和韭菜等很多年货。有一样东西,虽然小,也是离不开的,便是山里红。山里红,又叫红果和山楂。北京西北两面靠山,自己产这玩意儿,入秋就开始卖,但真正卖得红火,是在春节期间。

山里红,对于北京人最大的贡献,是做成了糖葫芦。对于山里红而言,借助于冰糖的外力作用,是一次链接,是一次整容,是一次华丽转身。以前,小贩沿街走巷卖,都会扛着一支稻草垛子或麦秸把子,把糖葫芦插在上面,像把一棵金色的圣诞树扛在背上。那时候,糖葫芦便宜,五分钱一串,属于平民食品,别看平常的日子里不怎么起眼,在春节期间却会攀到高峰,在庙会上,特别是在厂甸的庙会上,一下子成了主角。那劲头儿,颇像王宝强上了银幕,从一个农民工突然之间成了明星。

在厂甸的庙会上,卖的糖葫芦品种很多,有蘸糖的,也有不蘸糖的;有成串的,也有不成串的,更多的是穿成一长串,足有

□柳已青

传说,年是蹲踞光阴中的一头怪兽,每隔365天就出现一次,它吃掉了旧时光,带来了新的希望。

临近春节,成千上万的人在春运的路上。过年,制造出全家团聚的快乐景象,其实酝酿着更大的悲欢离合。

近日,大家都在忙年,我独躲在房间里翻看。找关于春节的书看,随手一翻,《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里说,自汉武帝颁布《太初历》起,新年就定在正月初一,此后历代相延。作为新年的春节,旧时叫新正、元日、元旦、正旦。看来,在春节前,没有人比“年”再古老的了,在新春面前,没有人比“年”更新。春节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古老的节日一直沿袭到今天,一些过年的仪式仍然完好,没有什么比传统的力量更伟大;而所谓一元复始、

敬畏春联

强推的结果,是有欠公允的。行政高压可执行一时,却不能风行一世,更不会世代因袭。春联之所以历经千载而不衰,迄今仍在中国民间尤其农村中盛行,与其独特的魅力密切相关。一是喜庆性。普天同庆,举国弘扬。除非家中有老人过世需守孝三年可以不贴,否则,过年时吃的可以耍点,穿的可以差点,春联却是一定要贴的。住宅的院门,屋门,房门上要贴,院内的照壁、墙面和大树、室内靠炕的墙壁、厨房的灶台要贴,店铺、作坊、柴房包括猪圈、鸡鸭舍也要贴,就连供奉神仙的地方亦不例外,要的就是这个到处红红火火、满眼红彤彤。二是祈禱性。除旧布新,福运来年。过去一年是丰收的,那也已是陈迹,希望来年有更大的收获;过去一年不如意,毕竟过去了,往事如烟,随风飘逝,有下坡就有上路,有困地便会有顺境,祈祷来年时来运转。于是,春联便成了寄托希望的吉祥物。三是人文性。家家户户红相似,户户家家联不同。大年三十下午,倘若你在村子里大街上一家接一家看春联,品咂其中寓意,会感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譬如,看到一家贴着“光荣人家,英雄门第”的春联,你便会知道这家是烈、军属或家中有立功之人;

和山里红一起过年

四五尺长,一串称之为“挂”。民国竹枝词说:“嚼来酸味喜儿童,果实点点一贯中,不论个儿偏论挂,卖时大挂喊山红。”说的就是这种大挂的山里红。春节期间逛庙会,一般的孩子都要买一挂,顶端插一面彩色的小旗,迎风招展,扛在肩头,是老北京过年的一景。

清时竹枝词有道:“约略酸味辨未知,便充药裹亦相宜。穿来不合牟尼数,却挂当胸红果儿。”说的是穿成珠串挂在胸前的糖葫芦,鲜红耀眼,犹如佛珠,沾点儿佛味。不过,这种传统如今几近消失。

过年买糖葫芦,不愿意花五分钱买一串那么便宜的,讲究一点儿的会到店里买。以前,卖糖葫芦最出名的店铺,北面数东安市场里的一品斋,南面数琉璃厂的信远斋。信远斋的糖葫芦不穿成串,论个儿卖,一个个盛在盒子里,晶莹剔透,红得像玛瑙,装进小匣子里,用红丝带一扎,是过年时的最好礼品。

老北京吃山里红最讲究的,是把山里红放在铁锅里,加上水

看到一户贴着“一枝粉笔,连绵化雨滋桃李;三尺讲台,摇曳春风抚栋梁”的春联,即可认定这是一个教师家庭。正是这般富有思想性和感情色彩,才使得春联有看头、有味道。相比之下,那种程式化的印刷品对联毫无生命力,贴上一副充其量只是个装点,图个形式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年三十上午赶集求了一包春联回家,因为不识字,看人家写时尚记得,临贴时却搞混了,又不好意思求人帮助贴,便凭着感觉贴了上去。门上的对联字大好认,没有搞错,那些该贴到墙壁、粮仓、猪圈里的小对联却出了岔子。大年初一早上,前来拜年的人发现:那炕头墙壁上本应贴“抬头见喜”的地方,却错误地贴上了“肥猪满圈”,猪圈里则阴差阳错地贴上了“抬头见喜”,寓意全反了。此事不胫而走,自然成了乡间的笑料,在一些喜欢给人起绰号的人嘴里,这家的夫人一下子变成了“老母猪”,小孩子则成了“小公猪”、“小母猪”。引以为戒,敝村乡亲们贴春联,尤其认真和恭敬。我那时没有念过几天书的父亲,过年贴春联,总要事先作好标记,固执地看着我们兄

和糖,还有桂花,熬烂成糊状,但不能成泥,里面还得有山里红的囫囫个儿。再一点,不能熬糊,那样颜色容易变深,必得鲜红透明,如同隔帘窥浴。然后,装进瓶子里卖,叫做炒红果,也叫温棒。可以说,山里红经过这么一折腾,就跟在太上老君的八卦丹炉里练就一样,成了仙,成了山里红的极品。过年的时候,不仅是讲究人家的一道凉菜,也是解酒的一剂好药。

老北京人过年时一般还要准备一样东西,即金糕,这是山里红脱胎换骨之后的另一种形式,即将其去核熬烂加矾冷凝成的一种小吃。这东西比起温棒来,物美价廉,却可以起到和温棒同样开胃解酒做凉菜的作用,更为普及而受大众欢迎。以前这东西叫做山楂糕,是下里巴人的一种小吃,后来慈禧太后好这一口,赐名为金糕,意思是金贵、不可多得。因是贡品而摇身一变成了老北京人过年送礼匣子里的一项内容,清时很是走俏,曾专有竹枝词咏叹:“南楂不与北楂同,妙制金糕属汇丰。色比胭脂

霸道的年与春节的酒

万象更新,这“新”也没有多少新意,不过是周而复始。不过,过年仍然是隆重的。

年味无处不在,鞭炮声,电视里贺新春的广告,分明提醒你,年节的气息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一进腊月门,同事就在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今年如何过年,是外出旅游,还是回老家?盘算着怎样才能买到一张火车票。如何孝敬父母?如何置办年货?单身小青年,一到年前则唉声叹气,闷闷不乐,那些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同事替他们出主意:到网上发个帖子,租个女友回家过年,说不定假戏真做……刚结婚的也不轻松,回谁家过年?

过年真是一种霸权,凭谁也无法逃脱。回家过年更是接受与拒绝的极端,能回家过年就欢欣鼓舞,否则伤感失落。过年的霸权意味还在于,你不得不做出选择,不能弃权。春

节预先设定了一个喜庆的背景,凡是和这个背景不和谐的都是不好的,即使你孤独、痛苦,在这个节日面前也要强作欢颜。“人生有很多种仪式,回家过年对中国人来说是这仪式中的极端。”追求中庸的国人,在春节这码事上,铺张渲染到了极点,归宿感,宗教感在春节这一特定时刻得到释放。一方面是与不幸告别,一方面对新年充满渴望;一方面对苦难快速遗忘,一方面激起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春节不仅是一个新与旧的交汇点,也是思想与情感的汇集处,是生命伦理和天地人神的沟通与交流。过年的霸权来源于时间的威严,来自于传统的巍峨耸立,不可逆转。过年的霸权还在于设置了一些禁忌,都是确保欢庆这一宏大的主题,幸好还有酒。

年酬谢了生命,美味的年货

弟贴,唯恐出半点儿差错。年复一年,对春联的敬畏、贴春联时的庄重,便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其实,人们喜爱和敬畏春联,从根本上说应归于春联中所蕴含的浓浓春意:“一年之计在于春”,什么都无法代替这个“春”字。春是一种无言的生机,它所寓意的永远都是未来时。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诱惑,又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有一年春节,我回故乡过年,与儿时伙伴聊起了村里的后生,得知那户贴错春联的人家,孙儿辈个个发奋,人人上了大学,一人正在复旦读博士,成了村里的骄傲。这个消息曾令我唏嘘不已,思绪万千。“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不正是人们一代一代重复着贴春联这个古老姿势,虔诚地、静静地让春联守卫在门口,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一点点融入“春”的新望之中的一个见证吗?这不正是小至一个家庭大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断在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中国强的一个缩影吗?让人欣喜的是,今天在通向“中国梦”的春天里,革故鼎新,除旧布新,正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个自觉担当,铿锵在深化改革的步履里。

甜如蜜,鲜醒消食有兼功。”

这里说的汇丰,指的是当时有名的汇丰斋,我小时候已经没有了,但离我家很近的鲜鱼口,另一家专卖金糕的老店泰兴号还在。就是泰兴号当年给慈禧太后进贡的山楂糕,慈禧太后为它命名金糕,还送了一块“泰兴号金糕张”的匾(泰兴号的老板姓张)。泰兴号在鲜鱼口一直挺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止。那时候,春节之前,家里必让我去它那里买金糕,一般是把它切成条,拌白菜心或萝卜丝当凉菜吃。店里的金糕一整块放在玻璃柜里,用一把细长的刀子切,上秤称好,再用一层薄薄的江米纸包好。江米纸半透明,里面胭脂色的山楂糕朦朦胧胧,如同半隐半现的睡美人,饿得我沒有回到家就已经把江米纸舔破了。而等不到过年,那一块金糕已经被我弟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吃得精光,父亲只好命我再去买。泰兴号店里已经人挤人,年的气氛很浓了。

犒赏了我们的胃口,飘香的美酒让我们丢掉了戒备,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在迎新年的那一刻达成了和解。正是酒的及时出现,让春节具有了狂欢的性质。在我的家乡,春节喝酒,醉了才算是进入过节的状态,走亲访友,“喝足了”、“喝痛快了”,方能显示出主人的热情与好客。古人在元日这天饮的酒叫做“椒柏酒”,目的是去邪长寿。我怀疑饮酒这一流传至今的民俗,是源自先人过年时与神交流的道具。酩酊大醉,灵魂仿佛脱离沉重的肉身,幻化入一个神仙的世界。

我们都在年的霸权下苟且偷生,在过年中寻找快乐,别管过年为人们出了一些难题,但谁又能拒绝年节的快乐呢?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只是潦草地安顿了我们的身体,过年是一种心境,心灵的家园才是重要的,有一句诗说得好——此心安处是故乡。